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民族史研究丛书

云南近现代 民族发展史

纲要

王文光 龙晓燕 李晓斌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资助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书系
民族史研究丛书

云南近现代 民族发展史

纲要

王文光 龙晓燕 李晓斌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王文光, 龙晓燕, 李晓斌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1112 - 825 - 3

I. 云… II. ①王…②龙…③李…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云南省—近代②少数民族—民族历史—云南省—现代 IV. K280.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8159 号

云南近现代民族发展史纲要

王文光 龙晓燕 李晓斌 著

策划编辑 张丽华
责任编辑 龙宝珍
封面设计 丁群亚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云南国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125
字 数 550 千
版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12 - 825 - 3
定 价 46.00 元

地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
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 650091)
发行电话: (0871) 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 - mail: market@ynup.com

目 录

序 论	(1)
第一章 清初至道光年间的云南民族	(15)
第一节 清初至道光年间云南历史发展概述	(15)
一、清中央政府对云南政区的设置与调整	(15)
二、清代对云南边防的重视及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布防	(20)
第二节 清初至道光年间云南民族的发展情况及分布	(27)
一、汉族	(27)
二、云南府的各民族	(31)
三、武定直隶州的彝族先民乌蛮	(34)
四、大理府的民族	(35)
五、丽江府的民族	(41)
六、楚雄府的民族	(44)
七、永昌府的民族	(47)
八、顺宁府的民族	(50)
九、蒙化厅的民族	(52)
十、永北直隶厅的民族	(53)
十一、景东直隶厅的民族	(54)
十二、普洱府的民族	(54)
十三、临安府的民族	(57)
十四、元江直隶州的民族	(63)
十五、镇沅直隶州的民族	(65)
十六、曲靖府的民族	(66)
十七、澄江府的民族	(67)
十八、广南府的民族	(68)
十九、开化府的民族	(69)
二十、东川府的民族	(69)

二十一、昭通府的民族	(70)
二十二、广西直隶州的民族	(71)
第三节 清初至道光年间云南的民族关系	(71)
一、政府政策与云南民族关系	(71)
二、云南各民族之间的竞争与冲突	(87)
三、本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	(97)
第四节 清初至道光年间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	(98)
一、本时期文化变迁的因素分析	(98)
二、本时期民族文化变迁的特点	(115)
第二章 咸同至光宣年间的云南民族	(122)
第一节 咸同至光宣年间云南历史发展概述	(122)
一、本时期清政府对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与布防	(122)
二、咸同至宣统年间云南的经济发展	(123)
第二节 咸同至光宣年间的云南民族及其分布	(128)
一、汉族	(129)
二、云南府的民族	(133)
三、大理府的民族	(135)
四、临安府的民族	(136)
五、楚雄府的民族	(139)
六、曲靖府的民族	(141)
七、丽江府的民族	(142)
八、普洱府的民族	(144)
九、永昌府的民族	(148)
十、开化府的民族	(150)
十一、东川府的民族	(152)
十二、昭通府的民族	(154)
十三、景东直隶厅的民族	(155)
十四、澄江府的民族	(156)
十五、广南府的民族	(157)
十六、顺宁府的民族	(159)
十七、永北直隶厅的民族	(160)
十八、广西直隶州的民族	(160)
十九、武定直隶州的民族	(161)

二十、元江直隶州的民族	(162)
二十一、镇沅直隶厅的民族	(163)
第三节 咸同至光宣年间的云南民族关系	(164)
一、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164)
二、英法入侵及云南各族人民与外国侵略者之间的关系	(175)
三、边疆危机中的云南民族关系	(189)
四、本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	(195)
第四节 咸同至光宣年间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	(196)
一、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格局更趋明显	(196)
二、基督教的传播与少数民族文化变迁	(202)
第三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	(206)
第一节 民国时期的云南	(206)
一、民国时期云南政治经济发展概况	(206)
二、民国时期在云南的政区设置	(209)
三、民国时期尚未改流的土司	(211)
第二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	(214)
一、汉族	(214)
二、对民国时期云南少数民族的认识	(216)
三、民国时期云南的少数民族及其分布	(219)
四、民国时期云南的少数民族人口	(238)
第三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关系	(245)
一、彝族统治集团的崛起	(245)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对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	(251)
三、边疆少数民族对国家政权深入的回应	(259)
四、云南各族人民与外国侵略者的关系	(265)
五、云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274)
六、本时期云南民族关系的特点	(277)
第四节 中华民国时期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	(277)
一、民国前后云南文化交流途径的发展、变化与局限性	(277)
二、民国时期的边政建设与文化变迁	(282)
三、民国时期的工业化进程与文化变迁	(286)

第四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云南民族	(295)
第一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云南历史发展概况	(295)
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程	(295)
二、以民族团结、共同进步为中心的民族工作	(297)
三、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区设置	(299)
第二节 汉族	(300)
第三节 新中国云南的民族识别工作	(302)
一、云南民族识别工作概说	(302)
二、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各民族的民族识别	(305)
三、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各民族的民族识别	(321)
四、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族和瑶族的民族识别	(325)
五、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佉族、布朗族、德昂族的民族识别	(327)
六、从北方进入云南的蒙古族、满族、回族的民族识别	(328)
七、“克木人”及其支系“莽人”的识别问题	(329)
第四节 21 世纪初云南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5)
一、昆明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5)
二、曲靖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6)
三、玉溪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7)
四、昭通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8)
五、楚雄彝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9)
六、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39)
七、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1)
八、普洱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1)
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2)
十、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3)
十一、保山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4)
十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4)
十三、丽江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5)
十四、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5)
十五、迪庆藏族自治州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6)
十六、临沧市民族的人口与分布	(346)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云南民族关系	(347)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50—1976 年）云南的民族关系	(347)

目 录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云南民族关系	(365)
第六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	(377)
一、1950年至1978年的云南民族文化变迁特点	(377)
二、1978年至今云南民族文化的变迁及其特点	(388)
附录一：云南民族自治地方一览表	(410)
附录二：云南少数民族称谓简表	(420)
附录三：云南省民委、云南省统计局关于印发《关于规范使用少数民族 称谓和云南省少数民族有关数据的意见》的通知	(425)
关于规范使用少数民族称谓和云南省少数民族有关数据的意见	(425)
附录四：云南省跨境民族境外分布一览表	(427)
附录五：云南省全省各民族人口数量一览表	(430)
附录六：云南省民族人口与分布一览表	(432)
后 记	(444)

序 论

严格意义上对云南民族史的系统研究和自觉的学科建设，始于1954年。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到云南大学视察，指示云南大学历史系的教学与科研要注意地方特点，重视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对这一指示，方国瑜教授积极响应，开出了《云南民族史》课程；其后尤中教授也参加讲授这门课，并写出了《云南民族史》讲义。从此对云南民族史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术队伍日益壮大，以云南民族史为核心的西南民族史研究成了云南学术界的一个优势学科，在全国处于绝对领先地位。

但美中不足之处是，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古代，研究人员的学术旨趣、研究内容、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古代的，而对近现代民族史的关注十分不够，迄今为止，对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具体来说是研究人员少、研究成果少、许多领域还是空白。对此，我们认为经过几代学者五十多年的研究，在继承老一辈学者对云南古代民族史研究的良好学术传统基础上，研究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时机已经成熟，有必要投入更多人力进行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的研究，将云南民族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使云南民族史研究成为贯通古今的严格意义上的云南民族通史研究。尽管可供参考的成果不多，尽管许多文献资料还需要去发掘整理，但这是必须要做的工作，因为其中已经包含着时代需要的创新。

云南近现代民族史研究应从社会经济发展上把握一个基本特征，从帝国主义入侵、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角度认识两大基本矛盾，从民族关系复杂多样的角度抓住三条发展线索，从云南各民族整体发展的角度重点研究四大内容。

一

一个基本特征，即云南各民族社会经济发 展的巨大不平衡性，具体表现为居住在平坝的民族发展快于居住于山地的民族；处于交通沿线的民族发展快于交通不便的民族；与汉族接触较多的民族其生产水平高于与汉族接触较少的民

族；较早纳入郡县统治的民族发展快于较晚纳入郡县统治的民族。^① 由于上述原因，各民族之间发展极不平衡，甚至连同一民族内的不同支系也有很大的差距，如滇中彝族、滇东南彝族与大小凉山彝族、滇东北彝族在经济发展上就有差距。

云南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首先是由云南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下面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云南自然生态环境的基本特征。

云南省地处高原，东边是云贵高原的西部，主要是海拔2 000米左右的山地和丘陵，西北部是横断山纵谷区，与青藏高原相连，高山大河相间。地势西北高，南部低，地形错综复杂。在这两大类地区之中，有1 400多个盆地（本地人叫做坝子）。从气温、降水等自然因素而言，云南南部优于北部。全省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地占了94%。广大的山地大致又可分为滇东高原、滇西高原、滇西南高原和西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云南的26个民族就分布在这以山为主的空间之中。

从总体上看，云南大致以元江河谷、云岭山脉东侧的宽谷盆地一线为界，把云南分为两大部分，该线以东是一块边缘破碎、中部较平坦的大高原，西部为山高谷深、山川并列的高中山山地。^② 这种地理条件使云南各民族的交往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尤其是在滇西北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地区更是如此，这对民族的发展也同样造成了限制，民族只能在相对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形成与发展，司马迁在2 000年前就说过：“西南夷君长以什数”，^③ 显然这种情况几千年来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其原因就是地理阻隔。

由于元江——红河一线是云南的一条自然地理分界线，必然反映出民族分布情况。元江——红河流域从民族分布的格局看，是氏羌族民族的后裔、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百越系民族后裔、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接触区，呈犬牙交错，向北走则壮侗语族的民族越来越少，最终消失在金沙江两岸，向南走则藏缅语族特别是彝语支的民族也呈递减的趋势。

此外，山多且海拔变化大导致了云南民族的立体分布格局，从而有了苗族住山头，傣族、布依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这样的说法。这种立体分布的格局除了历史上的政治原因外，与气候及地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民族的立体分布，肯定就有立体农业或者说云南各民族的立体经济，即东部滇东高

^① 例如滇池地区和洱海地区的民族就占了许多地理优势、区位优势，所以远在秦汉时代就被司马迁写入《史记·西南夷列传》，而地处怒江大峡谷和独龙江河谷的怒族、独龙族被人们认识和见于文献记载已经是很晚的事了。

^② 王跃声等：《云南地理》，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③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 991页。

原、滇西南高原的农耕经济较为发达，而以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为主的地区则是畜牧经济所占比重较大，而且这一现象已经持续了几千年，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早就有过描述：“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至桐西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叟、昆明，皆偏发，随畜迁徙，毋君长，毋长处，地方可数千里。”^① 综上可见，云南民族分布格局是云南地理生态环境的一个反映，反之也可说，云南地理生态环境决定着云南民族的分布格局。

如果以上的认识没有失之偏颇的话，我们认为：迄今为止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性，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是被云南的自然地理生态环境所制约和决定的。从明中叶开始，云南的坝区几乎都是汉族分布，到清代以后这一情况更为显著，所以汉族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二半山区或山腰有少数民族同汉族杂居，或者是同汉族聚居区相联结，或者是交通要道上的少数民族（如白族）聚居区，各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基本与汉族相同。但由于云南的山地占全省总面积的94%，大江大河对地形的切割非常严重，所以稍稍离县以上城市远一点的地方，各少数民族的发展就十分缓慢。到20世纪50年代，有些民族还长期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如拉祜族中的苦聪人），有些民族还沿用刀耕火种的生活方式（如基诺族，布朗族），总体上表现为尚未完成畜牧业和农业、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

由于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社会发展缓慢和经济结构单一，生产力水平低下，所以反映在社会形态上便是多种社会形态共存。到20世纪50年代尚有多种经济形态共存：封建经济（又分为封建地主经济和封建领主经济）、奴隶制、浓厚的原始公社残余、少量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各种社会经济类型也同样与地理环境条件相关，即封建地主经济分布在全省政治经济中心的坝区，封建领主经济主要在自然生态环境较好的西双版纳，而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便主要分布在山区和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边境地区。这种多元的情况一直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南的历史发展，影响着云南各民族的共同进步与共同发展。

同样是因为云南各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各民族为了生存，积极，主动地去适应生态环境，形成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形成了风格各异的物质文化，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精神文化。

地理原因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对云南各民族的治理也存在时间的差异，早期主要是益州郡，而益州郡并未将所有的云南民族纳入直接统治，哪怕改土归流后，也还有“江外宜土不宜流”的特殊政策，这客观上又延缓了民族的融

^① 《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91页。

合程度，加大了发展的不平衡。

在上述地理和历史的双重作用下，历代政府也看到了这种不平衡性，他们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云南是“蛮荒之地、化外之地”；从经济的角度认为云南是“不毛之地”；从生态的角度认为云南是“瘴疠之地”，所以在云南这一边疆地区采用了特别的统治方式，即历史上的羁縻制（如封滇王，句町王等）、土司制（如宣慰使、安抚司等），这些制度虽然适应了云南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但也扩大和加深了云南各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全国相比较，这种不平衡性更加明显，所以才有阎红彦的“云南边疆特殊论”，才有云南省情特征的“四高四低论”。反映到社会领域，便有了“云南是社会发展活化石”的比喻，不管这种认识是否有理论上的缺陷或认识上的偏差，但它明显地表现了云南民族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一基本事实。

总之，云南民族社会发展极大的不平衡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继续存在，特别是在省内中心城市快速发展之后，这种不平衡性更显得突出，例如国家特别关注的、发展极为缓慢的 22 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云南就有 7 个，国家级的贫困县、特困县更是数以十计，这些都是不平衡性的表现。

二

所谓两大基本矛盾，是指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云南各民族与封建统治的矛盾。1840 年以后，云南的民族关系和古代相比更加错综复杂，在原来云南各民族与封建统治的矛盾、与大民族主义的矛盾之外，增加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

从清朝的道光皇帝（1821 至 1850）开始，中国民族的发展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美列强大规模入侵中国，中国开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为英法列强对云南的入侵给云南各民族造成严重的后果，使各民族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冲击，经济开始萎缩，作为中国有机组成部分的云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也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在两大矛盾中，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鸦片战争对其直接冲击似乎不太大，但作为中国的一部分，同样是帝国主义的矛头直指之地，而且帝国主义对云南的染指还是打开中国后门总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占领印度后并不以此为满足，派遣西姆士出使缅甸，之后在他的《使缅记》报告中指出：滇缅之间存在着大宗的棉花贸易。另一个英国人海勒姆·考克斯也对缅甸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报道了

更为详细的情况。^①之后英国人便订下了借助缅甸打开中国后门的计划，故入侵云南就成了英国对华战略的目标。道光四年（1824年）英国发动了侵缅战争，强占了缅甸南部，随之便对滇缅交通进行了多次探测活动，处心积虑地企图从伊洛瓦底江经腾冲、大理、宜宾入川，进而将势力范围扩大到长江中下游。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被杀，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取得了在云南的许多特权。光绪二十年（1894年），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英国再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英续议滇缅商务条约附款》，夺取了中国云南的大片土地，取得了英国驻蛮允领事馆移驻腾冲，在思茅、腾冲设立海关的权利。宣统二年（1910年），英国出兵侵占了片马、古浪、岗房等地。^②

对云南的侵略，法国也不甘落后。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占领越南后，便以越南为基地，将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挑起了中法战争，侵占了云南猛乌、乌得等地。而腐朽的清政府妥协退让，不败而败，从1884年起，先后和法国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中法新约》、《越南边界通商章程》、《续议商务专条》等4个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使法国获得了在蒙自、蛮耗通商开埠和日后修筑进入云南的铁路等权利。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法国又和清政府签订了《中法商务专条》附章，约定将蛮耗关改在河口并在思茅设立海关。

在上述重大变化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云南各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外部环境开始发生变化，表现为国家主权行使受到干扰，领土不再完整，云南成了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云南各民族成为英、法两国掠夺的对象。因此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则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从此决定了云南民族近现代历史在政治方向上发展的基本势态。从马嘉理事件、刘永福抗法斗争、七府矿产事件、片马事件到班洪事件，云南各民族的反帝斗争精神都突出地表现了出来。

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云南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云南各民族人民与封建地主阶级及其代表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缓和，反而更加激化了。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下，中国农村自然经济遭到破坏，各族农民、手工业者日益贫困破产，土地兼并剧烈。鸦片输入激增，由此引起的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等问题较之战前严重。为了支付战费和赔款，清政府借端

^① 霍尔：《东南亚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13页。

^② 根据1960年中缅两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包括片马、古浪、岗房在内的153平方公里土地归还中国。

搜刮，中国人民所受的灾难更加深重。

清政府在云南的统治尤为黑暗，云南是当时全国赋税最高的两个省份之一，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人民受到的压迫更甚。在哀牢山彝族聚居地区，由于“清赋暴戾，遍地皆怨，滇夷尤不堪其苦”；在澜沧拉祜族地区，改土归流后实行土流兼治的政策，拉祜族人民既要负担粮银、门户、官吏、为流官服劳役、出白工，又要替土司耕种私庄田，受到双重的压迫。^①在此背景下，当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爆发后，云南各民族人民也纷纷响应，投身于反清斗争之中。

1853年，新平哈尼族田以政、彝族普顺义聚众起义；1856年，在清政府云南当局的煽动下，汉回的械斗仇杀，发展为全省性的屠杀回民，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爆发；同年在哀牢山区还爆发了李文学领导的彝族人民大起义。从杜文秀起义“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我军有三事焉：始则锄满，次则拊汉，三则锄奸”以及李文学起义“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口号来看，这些起义已经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复仇思想，锋芒直指清朝反动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具有浓厚的反封建斗争意识，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清政府的镇压下，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在坚持近20年后先后失败了，但它们在云南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云南各民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齐心协力反抗本国的反动统治，河口起义、腾越起义、辛亥昆明起义、云南护国起义、“一二·一”运动等都鲜明地表现了云南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

三

由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所以道光以后到中华民国时期，云南的民族关系也起了巨大的变化。之前民族关系主要是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关系，是各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关系的内容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但此后随着英、法帝国主义从越南、缅甸的进入，则增加了与英、法帝国主义的关系，关系的内容是领土主权、是民族危亡。从这个意义上讲，云南的事情已经是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所说：“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

^① 罗开云主编：《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近现代）史料概述》，云南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88页。

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① 因此，从民族关系的角度看，应抓住三条线索，第一条线索是中华民族与外来列强的关系线索，它处于核心地位，政治问题成了近代云南民族关系的主导性问题；第二条是1949年以前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与代表封建统治的中央政府的关系线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特征；第三条是各民族之间广泛的民间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线索。

第一条线索即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它处于云南近代民族关系最核心的地位。鸦片战争以后，英、法开始觊觎我国西南边疆。光绪元年（1875年）英国军官柏郎与翻译官马嘉理带领武装队伍侵入云南，当马嘉理在盈江西南的蛮允、雪列进入我国境内时，被景颇、傣、汉各族人民包围，英军开枪打死边民激起民愤，马嘉理被杀于户宋河边；中法战争期间，法国武装侵入云南省麻栗坡、马关两县，苗族项崇周领导苗、瑶、壮、傣、汉各族人民奋起抗战，进行了大小数十次战斗，收复了被法军侵占的麻栗坡、马关、河口一带失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英国武装入侵今怒江州泸水县片马地区的茨竹、派赖等地，受到当地土官与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宣统二年（1910年），英军再次侵占了片马，当地傈僳、景颇等族人民与英军继续展开了武装斗争；1934年，英国派兵进入阿佤山区的班洪，受到了佤族人民的强烈抵抗，与此同时，邻近地区的佤、拉祜、布朗、傣、汉各族人民还组成了“西南边防民众义勇军”进行支援，大败英军；抗日战争期间，云南各族人民艰苦奋斗，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修筑了长达958公里的滇缅公路，使支援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物资得以顺利运进。日本占领缅甸后，云南各族人民又赶筑了中印公路。当日寇从缅甸向云南边疆进攻的时候，云南的傣、景颇、傈僳、佤、拉祜、阿昌、德昂等少数民族人民组成了抗日游击队，给滇西抗战以有力的支持。

由于云南各民族在边疆危机、领土主权危机的情况下共同面对帝国主义，所以原来分布在边境一线的许多民族开始具有了中国国家意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在中华民族的政治利益、中华民族的感情方面产生了共同认识上的质与量的变化。从中华民族理论的角度看，云南各民族在民族情感上、民族心理上因为帝国主义的入侵，产生了一致性认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已能自觉认识到自己是中国人，守疆御敌于国门之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云南各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开始突破自己一个民族的范围，上升到中华民族的高度来认识。

总的说来，云南各民族人民在与帝国主义的对抗中，催生了国家意识、中华民族意识，从而使中华民族在从一个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变化中，增添了

^①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61页。

众多的推动力。云南各民族人民团结抗击帝国主义，成为了云南近代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主要内容。

云南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人侵和掠夺的正义斗争还包括反“洋教”运动在内。总结云南“教案”的直接原因，有的是洋传教士蔑视中国国家主权，有的是欺压中国民众，霸占田地财产，或教会中的人为非作歹，仗势欺人，从而引发教案。特别要说明的是，云南绝大多数“教案”都发生在少数民族地区，现略举几例如下：

光绪九年（1883年）二月十九日，浪穹（今洱源县）农民吴大发的女儿被教会司铎张若望侮辱霸占，吴大发便集合亲友傅小八等人前去向张若望索要女儿。沙凤村200多位白族群众群起响应，手持木棍、铁锄围攻教堂，打死张若望及男女教徒14人，并将教堂捣毁。

除浪穹教案外，给帝国主义巨大打击的还有同治二年（1863年）的昭通教案；光绪九年（1883年）的蒙化（今巍山县）教案；光绪十年（1884年）的永北（今永胜县）教案；同治元年（1862年）的阿墩子（今德钦县）教案；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白汉洛教案；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永善教案；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维西教案和德钦教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宾川教案。

上述云南各民族人民反洋教侵略的斗争，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表明云南各民族人民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和意愿，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开始淡化地域、民族、阶层的差异，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纽带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

第二条线索是1949年以前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人民与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中央政府的关系线索，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特征。鸦片战争以后，云南民族关系增加了新的内容，但省内的民族矛盾并未减弱，封建统治阶级不仅残酷剥削和压迫各族贫困农民，而且还实行反动的民族政策，利用民族矛盾，离间民族关系，引起民族仇杀，转移各民族人民反抗斗争的方向。1856年的杜文秀起义和李文学起义就是在此背景下爆发的。这两个起义喊出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革命满清”、“彝汉庶民，共襄义举”、“铲尽满清赃官，杀尽汉家庄主”的政治口号，实行“不分回汉，一体保护”、“不别彝汉，彝汉同利”的民族政策，起义队伍由多民族成分构成并且彼此之间互相援助，起义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它反映出云南各族人民在政治上开始觉醒，逐步摆脱了狭隘的民族复仇思想，在共同的反封建斗争中形成了团结战斗的民族关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观念。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开始在云南民族地区广泛传播，

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得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拥护，许多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也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中，成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骨干，如干崖傣族土司刀安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1908年，革命党人在云南先后发动了由多民族参加的河口起义、干崖起义，使得民主革命思想在云南民族地区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云南成为了最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之一。1911年10月27日，云南革命党人发动了腾越起义，推翻了清政府在滇西的统治，10月30日，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至此宣告结束。由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又于1915年发动了护国运动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响应，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但此后中国国内军阀割据，云南也陷入了军阀统治之中，社会矛盾更加剧烈，各族人民悲惨的命运没有得到丝毫改变，反抗地方官僚、土司统治的斗争未曾停息。1949年12月，云南和平解放以后，云南各族人民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真正实现了各民族的自由与平等。

第三条线索是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广泛的民间经济交往、文化交流是不同生态环境条件下各民族的物物交换、互通有无、互相帮助、族际通婚。近代由于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得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隔阂，少数民族对于汉族戒备甚严，疑心很大，甚至出现汉到夷走的情况。但这些都不足以掩盖云南各族人民在共同保卫和建设祖国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之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建立的密不可分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存关系。

清代以来，随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逐步改土归流以及近代矿业、交通和商业的发展，汉族大量迁入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原来的封闭状态，促进了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学习。许多汉族和少数民族同居村落，贸易往来，互相学习经济文化、生产技术。汉族向少数民族学习到了畜牧业生产知识，少数民族人民向汉族学习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互相学习语言文字，逐步接受了对方的生活习俗，进而互相通婚的现象也逐步增多。例如由于波龙银矿的开发，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随之传到了德昂族地区，汉族在当地种植梗米，并把这些技术传给了德昂人，使得德昂族人民的粮食产量有了提高。清同治年间，澜沧拉祜族政治宗教首领三佛祖率领部分拉祜族和汉族进入西盟地区，许多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如犁、斧子和条锄等随之进入佤族地区。近百年来，在滇西定居的汉族把种植白菜、芥菜的技术传授给傣族，促使他们改变了不种蔬菜的习惯。片马事件后，为了保卫和开发边疆，云南地方政府组织了“怒俅殖边总队”进驻怒江地区，随即许多手工业者、商贩以及知识分子也来